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非洲民主为何被称作『视觉民主』

□ 闫 健

在众多非洲国家，民主化浪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庇护网络下权力的个人化与排他性的利益分配依旧是非洲政治的现实，非洲政治的实质依然深藏于其“非正式性”之中。

2015年7月，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推动修宪并“如愿”获得了第三个任期，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事实上，通过修改宪法来延长任期早已是非洲众多民选总统的保留选项。在乌干达，虽然穆萨文尼总统积极推动了一党制向多党选举制度的转型。但是，通过修改宪法，他已经连续获得了四个任期并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执政。在卢旺达，2015年的全民公决同意延长总统任期，这意味着2000年上任的卡加梅总统将有可能继续执政到2034年。在刚果（布），2015年10月的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为恩格索总统寻求第三个任期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此外，赞比亚总统齐卢巴、马拉维总统穆卢齐、贝宁总统亚伊、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以及刚果（金）总统小卡比拉都曾试图通过修宪延长任期，尽管最终均未能成功。事实上，如若不是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他们均有可能实现第三个任期的梦想。对于众多非洲民选总统而言，交出权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任期制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非洲国家带来的最为显见的政治成果之一。这既是对先前非洲一党制国家和军人政权独裁经历的反思结果，也是对非洲国家独立之初的民主实践的痛定思痛。作为“去殖民化运动”安排的主要内容，大多数非洲新生国家在独立之初均采取了从欧洲宗主国移植的议会民主制，而后者并没有任期方面的限制。然而，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殖民者遗留下来的政治安排在短短几年内便土崩瓦解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缺乏任期方面的限制，这使得在任者得以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为日后的一党制政权和军人政权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大陆20多年后，任期制仍未能抑制众多非洲执政者寻求第三个任期的冲动。这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民主化浪潮究竟为非洲大陆带来了怎样的政治变迁？

非洲的民主化浪潮

非洲的民主化浪潮出现在冷战终结的大背景之下。冷战的结束使得非洲的独裁者难以利用其战略地位在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得以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非洲国家做出政治改变。所谓的“援助条件性”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1989年11月，世界银行在其非洲报告中要求非洲各国实现善治。一年半后，美国颁布了新的对外援助大纲，明确提出“对特定国家的援助将考虑其在民主方面的进步”。此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洲的民主化浪潮更多是执政者对于当时国际压力所做出的反应，而非社会内生力量推动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非洲的一党制和军人政权下不存在反抗力量，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反抗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民主的力量。这也是为何一些学者将一些非洲国家的民主称为“视觉民主”，即统治者为了继续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而进行的“自我形象改善”。

定期上演的政治现象

如是，则观察者们原本就不应对非洲的民主化浪潮抱有过高的期望。即便如此，民主化浪潮至少为非洲大陆带来了政治形式的巨大变化。很多非洲国家一夜之间涌现出数以百计的政党，多党竞争选举以及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成为很多非洲国家定期上演的政治现象。保罗·科利尔将这种现象称为“民主狂躁症”，即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洲各国统治者均急切地想为非洲国家带来民主政治的形式，却忽视了民主制度良好运转所必须满足的社会条件并且低估了民主制度构建的困难与风险。如科利尔所言，“我们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推行民主的难度并过于关注民主的不恰当方面，即过分关注民主的形式而不是那些至关重要的基础条件。我认为，在那些不存在民主基础条件的地方，创建一个民主的假象很有可能挫败民主责任性而不是推进它”。

被激化的社会问题

对于很多非洲国家而言，民主形式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深层次政治和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还会激化这些问题。例如，1994年发生在布伦迪和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与两国仓促引入多党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胡图族候选人赢得选举引发了人数占少数的图西族人的恐慌，选举政治与族群冲突的相互交织直接促成了战后最为惨痛的种族屠杀的发生。在几乎所有经历了民主化浪潮的非洲国家中，族群问题都直接或潜在地影响着政治过程。对于大多数非洲选民而言，选举并不意味着对于不同候选人政策主张的选择，相反，投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族群和地区的界限。常常的结果是，某一族群的候选人获得了该族群所有选民的选票。这也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多党选举并未带来国家认同的提升——在公民中间培育起政治共同体感恰恰是民主制度有效运转的前提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化浪潮给非洲政治带来的冲击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换言之，非洲政治的连续性可能要超出我们先前的想象。这种连续性既体现在根深蒂固的族群认同上，也表现在非洲政治中无所不在的庇护网络之中。在众多非洲国家，民主化浪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庇护网络下权力的个人化与排他性的利益分配依旧是非洲政治的现实，非洲政治的实质依然深藏于其“非正式性”之中，即便现在有了更为民主的政治形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民主转型并不能直接转换为非洲国家治理绩效的根本改善。根据2002年非洲联盟的一项研究，非洲大陆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损失大约为1500亿美元，而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西方国家2008年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为225亿美元，不到非洲腐败问题导致的损失的五分之一。

因此，这些非洲国家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而在这些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之前，民主制度的正向效用便难以发挥出来。

环球瞭望

热点透析

G20与中国参与重构国际秩序

□ 张仕荣

2008年后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论坛，而伴随着中国在历届G20峰会上的精彩亮相，中国参与重构国际秩序的努力受到全球瞩目，2016年G20杭州峰会更使中国崛起及参与主导全球经济政策走向的趋势愈发明显。

2008年之前，G20只是一个松散的定位为八国集团（G8）次中心的国际经济对话论坛，主导全球经济话语权的是G8。进入21世纪，G8认识到中国的经济上的巨大进步，多次邀请中国入围，但是中国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属性没有加入，致使G8的代表性多次受到质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发言权的呼声日益增强。1999年6月，在德国科隆举行的八国财长会议提出为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要吸收更多国家就全球经济及国际货币政策等问题举行对话，以利于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同年12月，八国集团财长在德国柏林与欧盟及发展中国家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共创20国集团(G20)国际经济合作非正式论坛会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G20取代G8的趋势日益明显。2009年9月25日，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和欧洲联盟领导人在美国匹兹堡宣布，二十国集团（G20）代替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八国集团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上退居次席。

中国作为G20成员国的作用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针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势头，中国一直秉公直言，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沉疴痼疾提出了全面和彻底的革新方案。

2008年11月，首届G20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国呼吁采取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深化国际金融监管等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而峰会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达成重要共识，通过了47条金融领域改革行动计划。2009年4月英国伦敦峰会出台了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中国则表示将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峰会上，中国提出了“坚定不移刺激经济增长”“坚定不移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三大政策主张，而匹兹堡峰会除了确立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外，还确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金融机构量化改革目标，启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以及相互评估进程，因此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2010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峰会上中国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同时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2010年11月，韩国首尔峰会完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量化改革目标，就全球经济失衡制定“参考性指南”达成原则共识，中国则在首尔峰会全面阐述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完整构想：“完善框架机制，推动合作发展；倡导开放贸易，推动协调发展；完善金融体系，推动稳定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推动平衡发展。”

2011年11月，中国在法国戛纳峰会上呼吁抓住世界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提出“在增长中兼顾平衡，在合作中谋求共赢，在改革中完善治理，坚持在创新中不断前进，”峰会也就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促进增长和就业行动计划，并建立更为稳定和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经济治理达成重要共识。

2012年6月，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中国则希望各国共同建立一个惠及所有国家和民众的金融体系。

201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上中国主张各国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自己的经济不出大的乱子；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各有关国家要进一步抓紧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峰会决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特别是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把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长至2016年。

2014年11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以“增长、就业和抗风险”为主题，致力于实现未来5年二十国集团整体经济增长在当前政策水平上额外提高2%以上的目标。中国的主张一直引领峰会的成果，即：各国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

2015年11月土耳其安塔利亚决定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增加人民福祉，致力于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促进全球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中国则主张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从对历届峰会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国元素”一直是历届峰会的亮点之一，“中国智慧”也一直引领着峰会的发展走向，中国提出的“改革”、“包容”、“开放”、“可持续”等词汇成为历届峰会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同时与各国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理念高度契合。

中国话语权提升

中国话语权的取得源于实力的上升与贡献的彰显。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3年的五年间，中国一国贡献了全球总GDP增长量的37.6%，起到了全球经济火车头的作用。2014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达到27.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一引擎。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25%以上。2012年6月，在墨西哥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宣布支持并决定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

习近平主席指出：“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中国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制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前中国在IMF的投票权排在第6位，位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之后，印度排在第11位。2016年1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中国投票权由此前的第6位升至第3位，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也将跻身前十，新兴市场话语权大幅提升。该修正案是IMF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这一调整需要获得拥有85%投票权的国家通过，而美国拥有16.7%的投票权，可以一票否决。尽管奥巴马政府对此表示支持，而过去美国共和党一直阻挠IMF采取这一行动，经历了五年的艰苦博弈后，美国国会才勉强通过。而IMF的投票权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改革，中国投票权只上升了2%，并不影响美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而新兴经济体在IMF内权利受限是现实的困境。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的话语权在上升，但是中国还要面对西方国家在整个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面对新形势，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日益显示出其改变全球治理模式的趋向。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自2011年年底开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相继推出，表明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足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为了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他们正结成新的“神圣同盟”，力图树立新规。这些“新规”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当前，美国、日本甚至还有重启G7机制取代G20的全球经济治理核心论坛的企图，以此压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

当前，二十国集团作为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成员，拥有全球三分之二左右的人口和科技人员，产生全球9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专利授权量和学术论文，在全球发展中举足轻重。中国是全球创新体系的受益者与推动力，杭州峰会将由中国首次倡导创新发展理念，形成全球创新发展共识，凝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世界创新发展。

俄罗斯困局：再提结构性改革

□ 韩奕琛

当前，俄罗斯经济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困难。西方制裁难消，油价低位徘徊，卢布大幅贬值，反危机计划作用有限，俄罗斯深陷衰退泥沼，2016年依然难以回暖。严峻的形势下，俄罗斯各界再次提出经济改革。

严重依赖能源行业的现有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性改革在俄罗斯从来不是新鲜话题。俄罗斯地大物博，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丰富。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地缘政治潜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油气大国的地位奠定。但资源禀赋虽然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财富，但也使其深受资源经济掣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俄罗斯严重依赖能源行业，经济发展出口导向，贸易结构单一，能源出口额约占出口总额的70%、政府预算收入的50%和GDP的10%。这使俄罗斯经济发展受到外部因素限制，国际能源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和GDP。根据俄罗斯专家评估，国际油价每降低10美元会使俄财政赤字增加GDP的1.4%。2016年俄政府将预算赤字定为GDP的3%。在油气出口量价齐跌，预算收入不足的背景下，俄政府不得不继续缩减预算支出，冻结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增长，各地方也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克服经济结构痼疾，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发展模式，建立更加现代化、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然而资本天然逐利。投资往往首先流向盈利水平高的经济部门。高油价时代，油气行业发展顺风顺水。大量流入的石油美元使投资集中于油气行业，非能源行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高油价增加了企业负担，导致其他行业竞争力下降，发展滞后。于是，在顺遂的发展环境中，俄罗斯无心变革，结构性改革停在纸面，经济对油气行业的倚重反而越来越深。当油价下降，外部市场恶化时，政府底气不足，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失去改革资本，无力进行结构性调整。甚至油气行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对俄实施制裁，限制俄企获得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西方能源企业也减少甚至终止与俄企合作，俄油气企业受到打击。总之，俄罗斯陷入顺境时无心改革、逆境时无力改革的怪圈。多年来结构性改革之声不绝于耳，却一直未能实现。俄罗斯经济始终难以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经济增长与油价起伏直接挂钩。

政治治理模式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政治治理模式也是俄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其实，21世纪之初，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曾受益于国家对经济的高度管理和控制。叶利钦时期，中央对地方控制不够，议会党派多，寡头干政严重，控制金融、能源、媒体等重要行业，国家管理失序，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国际地位不断下降。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将改变国家治理的混乱无序作为首要任务，建立起垂直权力体系，恢复国家秩序：划分联邦区，设立总统特别代表，建立起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建立亲总统的统一俄罗斯党，成为议会中支持总统决议的最坚实力量；建立起核心决策圈，国家决策掌握在普京及其亲信手中。可以说，普京一改叶利钦时代弱政府强社会的格局，强化国家权威和政府控制，使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重新恢复秩序。

经济上，普京大力打击寡头经济，收回国家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权，将油气行业、金融业、媒体业等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但是，一方面国家的高度掌控没有在根本上改善俄罗斯的营商环境和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条件，反而削弱了市场竞争，使俄罗斯非国营经济竞争力低下，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另一方面，政府仍然没有推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没有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大力打击老寡头之后，普京在圣彼得堡和强力部门的老友、旧部掌握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控制能源资源领域，经济发展的背后是总统对各部门的全面掌控。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有一定程度的威权主义色彩。

威权主义的管理体制曾使俄罗斯的资源经济实现最大效益，但也强化了对资源出口的依赖，固化了其经济结构。普京的前两个任期内，乘着国际油价上涨的东风，俄政府利用超额石油收入建立起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成为俄罗斯对抗危机的“安全囊”。俄罗斯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从2000年至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2%。俄罗斯进入金砖国家行列，成为新兴国家的代表。8年的繁荣发展使政府对社会的投入不断加大，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国际地位也得到提升，普京支持率持续处于高位。经济繁荣和国力地位的恢复成为普京执政合法性的最大来源。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次年GDP大跌7.8%，终结高增长时代。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发起制裁，油价持续下跌，积极的外部因素被负面因素取代。尚未恢复元气的俄罗斯经济再遭打击，结构性弊病尽显。

经济危机再次引发结构性改革思考

此次经济危机再次引起对结构性改革的思考。但短期来看，资源经济和威权政治都很难发生改变。俄罗斯经济可能进入长期停滞，呈L形曲线，长期在谷底徘徊。从2008年经济危机至2014年，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23%。2015年更是下跌3.7%。如果国际油价保持低位，俄罗斯经济回暖将非常困难。

此外，当前俄罗斯更大的挑战是社会和内政问题。普京早年的高支持率源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如今，居民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恶化，不满情绪逐渐积累。如何在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下赢得今年9月的杜马选举是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面临的重大难题。此次杜马选举是普京复任之后的第一次，也是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前的重要考验。普京说的“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言犹在耳，而当前的困难使其诺言难以兑现。尽管在克里米亚入俄的鼓舞下，普通民众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普京仍然保持高支持率，但如果不能扭转经济颓势，恢复生活水平，经济危机难免向社会领域甚至政治领域蔓延。